

第一循吏孙叔敖

周 强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第七季）大型征文

孙叔敖(约前630—前593年),半姓,蒯氏,名敖,字孙叔,春秋楚国期思邑(今河南省淮滨县期思镇)人,曾三次担任楚国令尹(宰相)。他以中国“循吏”第一人的身份在历史上出现,他给淮南人民留下的遗产是泽惠当地2500余年的芍陂(安丰塘)。

何谓“循吏”?按照司马迁解释,就是遵奉法律、按照情理办事的官吏。在司马迁时代,能进入他视野的循吏只有5个人,即楚国孙叔敖、郑国子产、鲁国公仪休、楚国石奢、晋国李离。两千多年过去,老百姓能够记住并了解的,恐怕也只有孙叔敖和子产了。

孙叔敖所以成为天下第一循吏,是由他的政治品质和道德操守决定的。

心中有民

孙叔敖小的时候,心里就想着别人。有一次出门,路上看见一条两头蛇,他将蛇杀了埋掉后回家,哭着对母亲说:“我听说人见了两头蛇就会死。刚才我看见了它,恐怕我也要离开母亲而死了。”母亲问他蛇现在何处?他回答说:“我担心别人见到这条蛇也会死去,就把它杀埋了。”母亲说:“你做了好事,老天一定会保佑你的,不要担心。”这就是最朴素的家风教育。因为平安无事,他更相信母亲的话,要做好人,必须要多做好事。楚国老百姓后来都知道了这件事,听说他将出任高官,都很高兴地说:“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

孙叔敖当了令尹后,在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规令时,他体恤民情,努力做到亲民便民爱民。楚庄王嫌弃楚国的车子太小,于是命令全国一律改造高大的车子。孙叔敖劝谏说,如果以行政命令来强制推行,一定会招致老百姓的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都做高些,低矮的车子过不去,人们自然会将会矮车改造成高车。后来这样做了,果然在老百姓中没有引起什么波动。当时楚国流通贝壳形铜币“蚁鼻钱”,楚庄王认为这种货币重量太轻,下令改铸大功,强令流通。老百姓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商贾们也蒙受损失,纷纷放弃经营,引起市场混乱。于是孙叔敖劝说楚庄王,恢复原来流通的蚁鼻钱,很快市场又恢复了繁荣。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他鼓励大家在秋冬季节进山,采伐竹木,就地贮存。待春夏山水泛滥,再顺流运出售卖,老百姓从辛苦的劳作中得到实惠,自然要感恩政府。联想起战国时代孟轲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但孙叔敖的民本“实践”却比儒家亚圣孟轲的理论要早出250多年。

心中有国

非常庆幸,孙叔敖执政时,辅佐的是明君楚庄王。楚庄王是位很有抱负的国君,“一鸣惊人”说的就是他的故事。这时的楚国正处于上升时期,东部疆界已经扩展到安徽省的无为与巢湖之间,淮南地区早已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国军队的战胜攻取,新区域的治理消化就成为宰辅孙叔敖的职责。他行使宰相的权力,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兴修了若干宏伟的农田水利工程,比如淮南的芍陂,在他河南省家乡的期思陂,还有湖北省内沟通长江和汉水的“云梦通渠”。现如今,期思陂早已淹没,云梦通渠也只在有关专业地图中才偶有出现,而芍陂至今仍然在发挥着效益,成为寿县人民的当家塘、幸福塘,“寿人至今德之”。

在孙叔敖心中,“国”与“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众多



孙叔敖雕像

的水利工程竣工,丰产的稻米填满了老百姓的米袋子,利民;源源不断的军粮输送至争霸前线,利国。同时,他还注重冶金业、牧业和渔业的发展。尤其是鼓励民众上山采矿,使楚国的青铜冶炼和铸铁工艺在诸侯中处于领先地位,国力也不断增强。

孙叔敖执政期间,楚国社会出现少有的“富人喜,优瞻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螣,丰年蕃庶”的安乐祥和景象。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军与霸主之国的晋军会战于位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郊地,楚军一举获胜,楚庄王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成为春秋时期第三位霸主,作为宰辅的孙叔敖功不可没。



孙叔敖纪念馆

心中有戒

《列子·说符》和《淮南子·道应训》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隐士狐丘丈人对孙叔敖说:有三种情况会招致社会上对你的怨恨。一个人地位高了,任何人都嫉妒;官做得太大,君主不放心;待遇高了,承担的责任就大,招致的仇怨也就多了。孙叔敖表示,我的地位越高越要谦虚,要对别人更加尊重;我的官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小心,没有一点傲慢;我的待遇虽然越来越多,但可以用来帮助更多的贫困者。我以后就用这些做法来免除“三怨”。

楚国王公贵族出行都用膘肥体壮的公马拉车,但他出行乘坐的只是竹木做的旧车,驾车的也是瘦弱的母马。侍从们看不过去,就问他,“驾驶又新又好的车子才安全,用健壮的公马拉车速度才能快,穿狐皮做成的衣服才暖和,国相你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呢?”孙叔敖回答说:“我听说,君子服饰穿着漂亮,应当显得谦恭一些才是;小人服饰穿着漂亮,容易表现得倨傲无礼。我这个人德行不够,不能承受啊!”

孙叔敖淡泊名利,将高官厚禄看得很轻,“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也是如此,他的妻子从来没穿过丝绸一类的高档服装,驾车的马匹也从不上等饲料。

孙叔敖的身后有些令人泪目。他在任期间,功劳卓著,但从不接受楚王的封赏,家无余财,晚年非常穷困。孙叔敖病危弥留之际还告诫儿子:大王多次要封赏土地给我,我都没有接受。如果我死了,楚王一定会给予你们很丰厚的赏赐,但是你们千万不能接受,只能选择偏远的薄地去生活。后来,孙叔敖的儿子生活极端困顿,伶人优孟以演戏的形式向楚庄王反映了情况,楚庄王深受震动,于是准备封赏,但孙叔敖后人只接受寝丘之地,也就是埋葬亡人的荒丘。因为偏处一隅,无人觊觎,使得孙叔敖后人能够存身自处,家世绵延。

孙叔敖主持兴修的安丰塘在民间素有“天下第一塘”之称,现在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在北魏之前,当地的老百姓就在安丰塘北岸修建了孙叔敖祠堂,对这位“循吏”进行永久纪念。现在,风光绮丽的安丰塘和古色古香的孙叔敖祠堂已经成为淮南旅游的地标风景之一,孙叔敖也以这种形式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浅议淮河流域文化体

南 陵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第四季)征文

淮河文化是安徽的四大文化圈之一。安徽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形、地貌的特点,形成四大文化圈(包括淮河文化、庐州文化、徽文化、皖江文化),各具特色,影响深远,淮河文化因基本上均在安徽淮河两岸,作为区域文化,故可综合称皖文化,是炎黄子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淮河流域就有人类活动。目前已经发现的远古时代的文化遗址,就达100多处。我国的孔孟儒家学说,墨家学派,韩非、李斯的法家学说,都是在淮河流域创立的。

春秋战国时期襄公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出生在安徽颍上县,在这里建有纪念管仲的管鲍祠。安徽宿州有陈胜、吴广宣布起义、结盟誓师的“涉故台”,驻扎练武的“七十二营盘”和“骑路”。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的出生地安徽亳州,有曹操青年时期读书遗址,视察农田的东西观稼台、屯粮遗址、演兵处、歇马池和棚马墙等。最为珍贵的是曹氏墓群和曹操地下运兵道。亳州还有纪念三国时神医华佗的华祖庙。“建安七子”大多出生于淮河流域。

在很古很古的时候,中国从西向东有三条江河;北方的一条水是黄色的,炎黄二帝又出生在那里,人们就称它为黄河;南方的一条,水系很长很长,而且水流得很快,人们就叫它为长江;中间的一条按照方位人们叫它中河,由于这条河富饶秀美、气候宜人,“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引得古人纷纷来此集居;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开始觉得中河名只能反映它的位置,而不能反映它的自然形美,于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就依据古淮河比长江、黄河都短,而且淮水美如“鸟之短尾”的意境,用象形字“水”与“隹”(zhui,短尾鸟名)合并,创造了“淮”字,并将中河之名改为淮河。

淮河,是我国一条古老而又独具地域特色的河流,与我国长江、黄河、济水齐名于世,并称“四渎”。淮河流域,不仅是我国闻名的战略要地之一,而且是苏、鲁、豫、皖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它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悲壮的历史沉积将我们带入了博大的淮河文化空间……

由于淮河是我国东部的南北分

界线,淮河流域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过渡地带。所以,淮河文化便在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寿县西北的古战场八公山,三面临江,主峰东侧有“汉淮南王刘安之墓”,西侧有战国时代名将廉颇的墓;山下即是当年秦晋泜水之战的晋军渡口“东津渡”。

山东泗水县的泉林,传说大禹治水曾经过此地,春秋末年孔子也曾到过这里,陪尾山西麓还保留着“子在川上处”的古迹;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曾来泉林追溯泗水的源流;唐朝诗人李白也曾在这里对酒高歌,留下了“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的名句。

地处淮河中游的安徽凤阳,建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皇陵”和“中都城”。

世世代代与淮水结下不解之缘的淮阴、淮安,地处淮河与洪泽湖的交汇口,这里地理优越、交通便捷,向有“九省通衢”、“南船北马交汇之所”之称,在中国漕运和交通史上被视为襟喉要地,明清两朝漕运总督署和负责河防要务的河道总督署曾设在这里。淮阴侯韩信、大学文学家吴承恩的故里也在这里,曾有“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之美誉;特别是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沉陷于淮河水下已达320余年的古泗州城,堪称“中国废贝”。气势恢宏的洪泽湖大堤绵延百里,成为闻名华夏的“水上长城”,从而使这片人文荟萃的热土成为一颗熠熠生辉的“淮上明珠”。

由于淮河贯穿中国中部,历史上多次南北分裂对峙,绝大多数以淮河流域为界,形成拉锯式战场,加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战争频繁;再由于黄河自东汉以来多次夺淮,借淮入海,水系和植被均受到严重破坏,使淮河流域地表文物、古代建筑几乎荡然无存,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难度,但从地面仅存一些遗址遗迹来看,如以芍陂(安丰塘)为代表的春秋时期孙叔敖(楚令尹)创建的水利工程,古寿县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凤阳明中都城等,就足以显示这一地区丰富的文化底蕴。同时,该地区地下文物仍极丰富,凡发掘出土者,皆光彩夺目。如在涡阳“天静宫”出土文物丰富,极具研究价值。特别是从1989年发现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经6个年头的发掘,发现了一个规模宏大聚落遗址,出土文物近5000件,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发现30多年来聚落研究的空白。固镇又发现新石器遗址和汉墓群。至于豫东、徐海一带出土文物,数量很多,价值亦高。由此可见,淮河文化研究领域广阔,是一块亟待开垦的文化沃土。

“闻鸡起舞”背后的真实历史

洞 鉴

讲述 淮南成语典故(第六季)大型征文

在广大历史爱好者心目中,两晋可以说是中华国运最为黯淡的一段时期,不用说根本比不上强唐、雄汉,就是积弱的南宋也没有落到东晋那种朝廷政令不出扬州、抑荆州权臣之鼻息的田地。明明在大一统之前,互不相让的魏、蜀、吴三国还各自完成了攻打异族的壮举,统一天下的晋朝反而被各路崛起的少数民族赶出了中原。

说句玩笑话,两晋留给我们的亮点恐怕就只有那一堆成语了——“咄咄怪事”“东山再起”“王谢风流”“草木皆兵”等等,在两晋时期出现的这些成语背后差不多都有一段故事。而在这些两晋的成语之中,今天我们要详细说上一说的“闻鸡起舞”了。

按照惯常的讲法,“闻鸡起舞”这一成语是说,祖逖青年时志向远大,有一次在夜里他被鸡叫声惊醒,就叫醒了与自己一起夜宿的友人,两个人一起起床舞剑,刻苦训练本领。后来祖逖果然成为国家栋梁,他带兵北伐,又留下了“中流击楫”的典故。在东西晋南北朝这数百年中,祖逖一个人给后世留下两个如此振奋人心的成语。

闻鸡起舞背后的意义

然而,“闻鸡起舞”这个成语最早的含义并非如此。祖逖少年时性格豁达浪荡,不学无术,让兄长们头疼不已,又假借兄长的名义在乡里施舍财物、收买人心。后来祖逖学向渐长,名声也大了起来,却迟迟不响应州郡的征辟。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祖逖是一个志向远大的爱国青年,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具有枭雄气质的危险人物。



凤阳明皇陵一隅

后来“闻鸡起舞”的事情可以说是更加能够证明祖逖的野心了,祖逖在夜里被“荒鸡”的叫声惊醒,所谓荒鸡就是指在三更以前鸣叫的鸡,古代以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为天下纷乱的不祥之兆——这也不能说是迷信,我们以常理来分析,就像《半夜鸡叫》那个故事里说的那样,鸡也是被火光惊醒才会在夜里叫起来,而古代夜里的火光要么是明火执仗的盗匪,要么就是在夜间行军的军队了。

我们再推算一下闻鸡起舞事件发生的时间,祖逖生于公元266年,在那场前后历时16年之久、让西晋朝廷一蹶不振的八王之乱于公元291年爆发时,祖逖刚好是在二十六岁之间,这跟《祖逖传》里的年龄差不多是能对付上的。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在“闻鸡起舞”的故事当中,这个荒鸡的叫声与八王之乱的兵灾是有直接关系的,确实预示着天下将乱,而祖逖却认为“此非恶声也”。也就是说,在祖逖看来,天下将乱是一件好事,他还因此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

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提及一下闻鸡起舞故事当中的另一个主角刘琨了。刘琨原本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学青年俱乐部“金谷园二十四友”的成员,在这二十四友里既有贾逵、石崇这样的土豪,又有潘岳、左思、陆机、陆云这样的文坛大咖,混迹于这个圈子的刘琨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纨绔子弟。

但是好在刘琨身上也有一股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气,《晋书》中是这样记载这两个人的友情的:“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就这样,两个年轻人成了至交好友。

后来这两个人中首先发迹的反而是刘琨,在八王之乱中,刘琨投笔从戎,以一军之将的身份加入了司马氏手足相残的内战中,并且有过高光表现。在八王之乱平息后,刘琨就被最后取胜的司马越提拔为并州刺史,出征因为遭到匈奴侵略而残破不堪的晋阳城。

经过刘琨的一番励精图治,晋阳成为拱卫西晋朝廷的重要据点,在与匈奴兵交战的过程中,刘琨还曾经以自己编写的乐曲勾起匈奴兵将的思乡之情,让五万敌兵不战而退,留下了“一曲胡笳救孤城”的千古佳话。

然而刘琨后来还是输给了自己的公子哥作派,因为在用人方面过于随性,很多能者有志之人纷纷弃他而去甚至与他反目成仇,最终也是因为不能听信忠言而遭受大败,只能忍痛放弃自己经营了十年的并州,逃往幽州依附鲜卑盟友。在失去了刘琨这一有力的屏障之后,匈奴很快攻陷了长安,西晋就此灭亡。

在幽州,寄人篱下的刘琨依然心系故国,他先是派出后来成为东晋名臣的温峤到扬州劝司马睿称帝,又屡次恳求鲜卑人出兵讨伐石勒。与此同时,祖逖也终于说服东晋朝廷派自己出兵北伐,看起来这对昔日的挚友终于有机会相聚于中原,一同为国事出力了。

但可惜终究刘琨没能实现夙愿,在鲜卑人的内乱之中,刘琨遭到猜忌;而东晋方面,准备行篡逆之事的权臣王敦也惧怕刘琨的声望,致信让鲜卑人杀死刘琨以绝后患。

刘琨被杀之前,将个人一生的志向写进了赠给亲友卢谡的诗中。在这首咏叹了诸多帝王将相伟业的长诗中,刘琨用“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留”这样伤感的句子写尽了有志不能伸的怅然。

之后,祖逖一直坚持北伐,直到他在几年后因为积劳和忧愤去世以前,河南一直为东晋所有。当“闻鸡起舞”这个词首次出现在历史上时,它固然是个带有贬义的词汇,但是看到祖逖和刘琨两个人后半生的所作所为,我们却不能不为他们奔赴国难的义举所感动,是他们为“闻鸡起舞”这个成语添上了一抹不灭的光辉。

传承淮南城市文脉须重视工业文化

张泽诚

楚文化大家谈(第四季)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现代意义上的淮南城市因煤而建、因煤而兴。作为淮南城市雏形的三镇,早期是村落稀疏、荒野未开、盗匪遍地、交通不便之地,如九龙岗“在建矿之初,为仅有三户居民的小村庄”,田家庵“昔为荒村”。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成立淮南煤矿局,始有近代工业之名。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建市与一五计划的大规模建设,淮南才真正成为了一座现代城市。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们在建设淮南城市文化时存在一种内在紧张,既要立足实际,使得自己的文化有来源根据,并依据这一来源发展文化,使人们有地方感、熟悉感、归属感;又要去迎合人们的审美喜好,忽略城市实际的本土文化背景,贴近遥远的古老文明,获得某种特定审美上的优势地位。这种矛盾导致了在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与市民记忆相连且仍具有实际功能的工业文化反而显得较为薄弱。

生活于其中的市民,永远是城市文化的主体。好古追远自有其价值,但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不能忽视广大市民的历史记忆。否则,在溯源历史文化时不仅难以自圆其说,在逻辑上造成巨大的裂隙,更可能使文化理念失去了生活根基,沦为空洞的口号。忽略了、仍然对公众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记忆,只能消解城市的文化魅力和市民的文化认同。

在城市的转型过程中,城市逐渐从生产型职能转向消费型职能,文化越发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以及创造力也越发被重视。市民受工业化文化浸染,对工业记忆有着浓厚的文化情感,更愿意去追溯遥远的先秦两汉,并把它们作为传承文化的源头。这种倾向与其说是历史的事实,倒不如说是文化精英所持有的一种对最久、最早、第一的审美喜好。殊不知汉淮南国的文化在历史长河